李鸿章访美趣闻

1896年，李鸿章一行访问到费城，当局格外巴结，说中国的贵人喜欢坐轿，于是，在李参观工厂或名胜时，就不用马车了，专门搞了一项豪华轿子让李鸿章乘坐。不巧的是抬轿的四个全是爱尔兰人，他们听李鸿章说华工比爱尔兰工好，心中气愤，便约好一齐罢工，不抬轿子了，以示抗议。

李鸿章心中不快，但马上就有一帮华人主动来抬轿子，李鸿章又高兴起来了。这些华人以能给李鸿章抬轿子为荣，中国人的抬轿技术自然是最好的，大家满脸自豪，浑身是劲，将李鸿

章抬得舒舒服服、飘飘荡荡、举举乎乎。轿子一抬却抬到了费城的唐人街上。

李鸿章忽然眼前一亮，放眼所见，全是中国式的建筑，黄面孔，黑头发，华人来来往往，街两边几乎全是中式餐馆。为欢迎李鸿章的来访，餐馆的门口全插着美国的星条旗和大清的黄龙旗。李鸿章大喜，停下轿子与华人见面。整条街上的华人乐疯了，一齐涌了过来叩见故国来的大官。

李鸿章在异国他乡见到这么多华人欢迎自己，心中激动，眼眶中湿润起来。众华人欢天喜地，向李鸿章介绍唐人街的情况。李鸿章

被他们的情绪感染，就笑问：“你们大家开餐馆，饭菜还是中国的口味吗？”众人大笑，就说：“请中堂随便进个馆子品尝，绝对正宗的中国口味。”李鸿章掀髯而笑，说：“出访了八九个月，吃腻了西餐，还真想尝尝中国的饭菜！”于是抬脚进了一家门脸儿看起来稍大点的餐馆。众随从自然在门外等候。这家餐馆的老板兴奋不已，立刻指挥厨师工作，做了最拿手的几十个菜，一个一端上来请李鸿章品尝。

费城的洋人们听说李鸿章在唐人街吃中餐，一个个惊奇不已，便呼朋唤友也

涌到唐人街来看。进了餐馆，他们就在门外、窗外探头探脑往里看，看见李鸿章笑眯眯吃得好不惬意，便猜想那菜一定很好吃，于是忙向旁边的华人打听菜叫什么名字，华人说了。接着又一盘菜上来了，洋人忙又问菜名，华人又说了。可菜越上越多，有许多菜连窗外的华人也不知道名字，便笼统地将不认识的菜叫做“杂碎”。杂碎出现的频率最高，等李鸿章吃完离开，洋人们把其他菜名全忘了，却记住了“杂碎”这道菜。洋人们于是三五成群，相约到唐人街，要吃李鸿章曾经吃过的杂碎。从此以后，“李鸿章杂碎”便成为北美一带中餐馆的招牌菜，家家餐馆都能做，让洋人们惊讶不已，大为羡慕。

摘自《团结报》

唐太宗驭下有高招

唐太宗李世民随李渊打天下时，身边有一帮子文臣武将，他们立下了汗马功劳。

李世民登基后，面临三个政治集团。一个是李渊集团，主要成员是太原起兵的策划者、追随者，如裴寂(在李渊朝任右仆射)，有的是隋唐旧臣，如萧王禹(在李渊朝任内史令)。太原起兵的策划者、追随者，自认为对唐王朝有功，资格老，傲视一切。隋朝的旧臣，做惯了高官，对官场的一套懂得多。这帮子人，等待新皇帝请教，等待尊崇。李世民处理不好与这帮人的关系，他们就会利用关系网，向李世民施加压力，甚至阻碍新政策的推行。

李世民8月登基，10月公布一份功臣名单，共13人。李世民将太原起兵的策划者、李渊集团的首脑人物裴寂列在第一位。这样，裴寂受到尊重，非常高兴。组织新政府时，李世民任命李渊集团的萧王禹为左仆射，宇文士及为中书令，封德彝为右仆射。

萧王禹这个人，很有来头，有一次，宫中举行酒宴，唐太宗说：“自认为是席中最尊贵的人，先斟酒。”当时，长孙无忌、房玄

龄等互相观望，未说话，他们为李世民夺权立功很大，萧王禹却伸手取杯。

太宗问：“你有什么理由，说一说？”

萧王禹说：“我是梁朝天子儿(后梁明帝之子)，隋皇皇后弟(萧姊为隋晋王妃。晋王即帝位，妃为后)，尚书左仆射，天子亲家翁(太宗李世民之女襄城公主，下嫁萧王禹之子萧锐为妻)。”

李世民听罢，拍案大笑。

经过一番安排，李渊集团的人安定下来，心悦诚服地支持李世民。

第二个集团是李建成当太子时网罗的一帮人。他们本来希望李建成当皇帝，自己能够飞黄腾达，但太子被杀，他们人心惶惶，十分恐惧，有的逃离京城。玄武门事变后，李世民被立为太子，立即派人把李建成的心腹魏征找来。

李世民斥责魏征：“你为什么离间我们兄弟之间的关系？”

魏征坦然答道：“先太子若早听我的，何至今日受

诛？”

李世民大怒为喜，称赞魏征耿直，以礼相待，推荐他为谏议大夫。

李世民早已看中魏征的才华，这一步棋很妙。李建成集团的人物，看到李世民的的大仇魏征都能被重用，恐惧的心理也就消除了。

任命魏征后，李世民叫来杜淹、王珪，这二人也是李建成集团的人，他任命杜淹为御史大夫，王珪为谏议大夫。这样，李世民化敌为友，把李建成集团的人才收为自己的部属。这些人感恩戴德，愿意死心为李世民效力。

李世民从太原起兵，被封秦王，到夺得皇位，他的手下人立下战功，在玄武门事变中，又为李世民夺皇权再次立功。这些人恃功自傲，难以驾驭，是第三个集团。

即位后，李世民封心腹秦叔宝为左武卫大将军，程知节为右武卫大将军，尉迟敬德为右武侯大将军，房玄龄为中书令，杜如晦为兵部尚

书。

李世民组成的政府班子，既有李渊集团的，又有李建成集团的，还有自己原来的部属。这样，可以通过李渊集团和李建成集团的人，对自己的部属加以牵制，防止他们居功自傲，更不可防止其势力过大。这是李世民的高明之处。

李世民特别注意分散朝臣的权力，扩大政府最高决策层次的人数，以防止少数大臣专权。他改革宰相制度，除三省(尚书省设左、右仆射；中书省设中书令；门下省设侍中，三省长官都是宰相)外，唐太宗设立“参议朝政”、“参与朝政”、“同中书门下三品”、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”、“同知政事”等名目，目的是，提拔品级不及宰相，但有才干和政治远见的官员，参与朝廷的最高决策。李世民还规定，中书省制定的诏敕由门下省进行审议，以防出差错。

李世民宽容大度，因而政治清明，经济发展，被后人称颂。

摘自《用人三十六计》

小时候上历史课，讲到鸦片战争，老师的讲话都是“中国军民始终不怕牺牲，英勇抗击侵略者，但是，我们使用大刀长矛，而对手船坚炮利，所以虽然中国军民浴血奋战，仍然难免失败的厄运。”

其实，清军是有火器的。

比如枪，我们在电影里常看到的鸟铳。

有多长？2.01米。射速，1到2发一分钟。

风雨天点火效能极差。

英军用的是伯克式前装滑膛燧发枪，枪长1.16米，射程200米，射速2至3发一分钟，有枪刺。

清军的鸟铳是从1548年的葡萄牙火绳枪改装而来，比英军落后200多年。

但让我吃惊的是，清朝当时其实是有燧发枪的。不过有严格的规定，只能用作御用枪。京营八旗用的枪其次，再次是驻防八旗的枪，最次就是绿营的鸟铳。

这种梯次质量配备，是为了巩固统治，以驻防监视绿营。而这种方式，却使清军的主力——绿营在鸦片战争中以最次的装备

晚清兵器

应敌。

炮也是。鸦片战争中，绝大多数战斗是清军的岸炮与英军的舰炮之间的炮战。整场战争中，清军未能击沉英国的一艘战舰或轮船，而自己的阵地千疮百孔。

单就炮弹来比，英国用的炮弹有实心弹、霰弹、爆破弹，清军用的都是效果最差的实心弹。

奇怪的是，今天到故宫博物院去看看，存在官里的清初的炮弹全都是“开花炮弹”(爆破弹)。但是当时主持海防的林则徐和当时的造炮专家黄冕，连“开花炮弹”是什么都不知道。因为这种技术百年来只被御林军专有。

久不使用，藏于深宫，连统治者本身也都忘记了。

就这样，清军以差距两百年的武器装备实战。

这些烂武器本身也陈旧不堪。一只鸟铳，用几十年极平常，甚至有使用了166年没有更换的，我的天。就这样的鸟铳，还因为军费限制而数量不足呢。

火炮也是这样，日晒

雨淋，炮身锈蚀，到鸦片战争，多是清初铸造，有的甚至是前明遗物。因为在大清的武器装备体制里，没有定期报废造换的更新制度。

这个体制，首先规定各种武器的型制，再按此规定制造工艺，再按此规定工价、料价。

这种制度下，新武器的研制从一开始就以不合规定而被拒绝，新工艺又因为不合规定而被排斥，最后又用权威价格将一切新因素封杀出局——不合规定不准报销。

物价、工价一直在涨，兵器制造的经费却是固定的。比如火药，雍正朝，每斤银2.6分，到了嘉庆年间是每斤银2.1分。制造者无利可图，反而亏损。

但是任何商人，从本地上绝不会做亏本生意。为了防止赔累，偷工减料成为必然。

1835年，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新制大炮40位，结果在试放过程中炸裂10位，炸死兵丁一人，炸伤一人，另还有5位火炮有其

他问题。他检查炸裂的火炮，发现“碎铁渣滓过多，膛内高低不平，更多孔眼”其中有一空洞“内可贮水四碗”。

为了偷工减料，贿赂验收官员又成了公开的秘密。魏源写过“中国之官炮，之官船，其工匠与监造之员，唯知畏累而省费，炮则并渣滓废铁入炉，安得不震裂？船则脆薄腐朽不中程，不足遇风涛，安能遇敌寇？”

我们从小背苦战争发生的年代和地点。听到的，往往是一句话的历史。

鸦片战争对我来说一直只是一个模糊的年份和一些“丧权辱国”的条约，直到现在，才因为工作需要，制作香港回归的节目，回头去看这场战争。才在“奸臣——忠臣”“投降——抵抗”“卖国——爱国”的教材模式之外，去了解数字和事实，才在传统史学“善恶”、“善恶”的宣传功能之外，看到历史学的另一种价值——在于提供错误，即失败的教训”。

茅海建说：“这是它最基本的价值。一个民族对自己历史的自我批判，正是它避免重蹈历史覆辙的坚实保证。”

摘自《南方都市报》

中国曾出过世界首富

1834年，中国曾出过世界首富。

17世纪后期，康熙皇帝暂时放宽了海禁政策，来华从事贸易的外国商人日益增多。于是，广东地方政府于1686年招募了13家较有实力的行商，指定他们与洋船上的外商做生意并代海关征收关税。从此，近代中国历史上著名的“广州十三行”诞生了。在以后的发展中，这些行商因办事效率高、应变能力强和诚实守信而深受外商欢迎。

1757年(乾隆二十二年)，清朝下令实行闭关锁国政策，仅保留广州一地作为对外通商港口。这一重大历史事件，直接促使广州十三行成为当时中国唯一合法的“外贸特区”，从而给行商们带来了巨大的商机。

在财富不断积累的过程中，广东十三行中涌现出了一批豪商巨富，如潘振承、潘有度、卢文锦、伍秉坚、叶上林等，以至于当时就流传有“洋船争出是官商，十字门开向二洋。五丝八丝广最好，银钱堆满十三行”的说法。在后世看来，这些行商无疑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中。

在广东十三行中，以同文行、广利行、怡和行、义和行最为著名。其中的怡和行，更因其主人伍秉坚而扬名天下。

在经营方面，伍秉坚依靠超前的经营理念，在对外贸易中迅速发财致富。他同欧美各国的重要客户都建立了紧密的联系。1834年以前，伍家与英商和美商每年的贸易额都达数百万银元。伍秉坚还是英国东印度公司最大的债权人，东印度公司有时资金周转不灵，常向伍家借贷。正因为如此，伍秉坚在当时西方商界享有极高的知名度，一些西方学者更称他是“天下第一富翁”。当时的欧洲茶叶质量十分挑剔，而伍秉坚所供应的茶叶曾被英国公司鉴定为最好的茶叶，标以最高价出售。此后，凡是装箱后盖有伍家戳记的茶叶，在国际市场上就能卖出高价。

在产业经营方面，伍秉坚不但在国内拥有地产、房产、茶园、店铺等，而且大胆地在大洋彼岸的美国进行铁路投资、证券交易并涉足保险业务等领域，使怡和行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跨国财团。

经过伍秉坚的努力，怡和行后来居上，取代同文行成为广州十三行的领袖。伍家所积累的财富更令人吃惊，据1834年伍家自己的估计，他们的财产已有2600万银元(相当于今天的50亿元人民币)，成为洋人眼中的世界首富。

摘自《文史》

ZHENGZHOU DAILY

编辑 孙明道 电话 67655582 E-mail:zzwbwh1616@sina.com

我的胃属命性好的那类，粗茶淡饭乐于接受，珍禽玉馐也可欣赏；遇上喜欢的东西，多一些消受起来无妨，差一点也能凑合过去。我基本不惯自己的胃，它也没什么坏毛病，冷暖自知，顺其自然。

在童年，我的家境不能算好，吃饭就显得尤为重要。这其中自有另一番的情境与趣味，只与身体直接对应，少与菜品中的雅致与高贵瓜葛，想来这或许更重要。有什么样的胃，便做什么样的人。我清楚这其中的道理，我的粗疏自然也就在劫难逃。没有别的，只是口中清味于我还是心里的事，无法割掉。

小时候，常听到原汤化原食。化解的材料大约与我们那个穷地方的物产有关，汤就自不待言了。陕西关中因产小麦黍子，牛羊肉泡馍比洛阳不过。与临近的开封、洛阳相比，西安在

误点是多快乐的事

陈祖芬

份善。一个女学生，如果不是很拮据，不会逃票。如果让她补票，她会脸红，会非常难为情，会伤害这个小小个子里的未必小小的自尊心。如此温厚地保护她的自尊，她日后还能不尊重检票员的工作？

乘客们大都在看书报，也有铺了一桌纸埋头工作的，好像车厢是个移动办公室，不，车厢更像图书馆，安静得连车厢内需在阅览室墙上贴条；不要大声喧哗。如果不是伸长耳朵去听，都不会觉得有人在轻声说话。

有人走动买回食品。英国火车上都有比16开杂志宽一些的牛皮纸拎袋，可以装进热汉堡包、小瓶酒和酒杯等。上车前买食品一样方便。每个车站都有几家快餐店，有“Take away(外带食品)”的供应，就是让人买了拿走的。车站有成排成排分

喝汤

杜爱民

不饥，气力仍然饱满。如果换成别的，怕是不能撑住。我对纯而淡的食物的认识，起始于汤。去安徽出差，饭前必备一道，叫开口汤，想必自有道理。上世纪六、七十年代，西安人家每天都离不开汤，原因直截了当，胀肚子还占地方，能在短时间里哄饱自己。大米那时少见，也谷黍，高粱米居多。再就是拌的稀面汤。虽然清汤稀水，辅以水芹、麦芹或白菜窝的酸菜，剁碎，撒些椒沫、浇沸油，绝对是夏天里的美味，解表消暑，不会造成身体的负担。

食汤可使神清气爽，当然是那种浓汤烈汤。前不久见过说李渔的文字，知其也是雅致闲淡的食中高手，他为朋友煮粥，不忘起锅前于其中添加几勺清露，味道

清香四溢，意蕴无穷。

黄昏时分喝汤在陕西农村是件讲究的事情。村里人碰上照面，总要说喝汤咧么。与河南人的甜汤相似，陕西的汤也是用麦面或玉米面拌制成的，不调加任何佐料。家境好的点盘小菜，有盐渍韭菜、白菜、萝卜。酱菜当然也成。差一些的清汤汤水水，用一道菜上醋盐辣椒，算是一碟辅菜，但每晚之前的这道汤是不能没有的。喝过了汤，晚上才算真正开始。乡里人用碗将海老，像一口小锅，喝汤爱蹲在自家的院门口，也有端着海碗在村中游走的，十足的解馋搅扰。

有一年，我去西安乡下参加麦收，遇上了喝汤的情景：村子院场大树底下的人群，聚拢着黑压压的人群，唏唏嘘嘘，有滋有味在喝，只是不见人脸，只见头脑还大的碗全都敞朝着天。

摘自《美文》

音员说，刚才很对不起，现在车上热饮料冷饮料一律免费供应。大家笑着自取饮料。乘务员一个个端着移动电话走来，让乘客们打电话告诉亲朋，原定20:40到站，现在改为21:22到。乘客有话没话说地故意打电话给亲朋玩。乘客笑，乘务员也笑，协同作案似的。

一位女性笑道，打个电话给梅杰吧。又有人说，打个电话到北京吧。乘客大笑，乘务员也大笑。原先图书馆般安静的车厢，这回变成喜剧剧场。好像每个人的笑细胞都给刺激起来了，一阵欢笑。

火车误点是多么快乐的事。又想起约克车站的播音员，总是用喜剧调的调门播站名，用歌唱来工作。我每次听见这播音总要笑，又笑了。回到北京还是笑着想起那歌曲：忙忙——斯尔，格拉斯——哥——

出门坐火车，原来可以是一种享乐。

摘自《东西南北》

好日子和坏日子，是有一定比例的。就是说，你的一生，不可能都是好日子——天天蜜里调油；也不可能都是坏日子——每时每刻黄连拌苦胆。最好是好日子交叉着来，如同一块花格子布。如果算下来，你的好日子多，就如同布面上的红黄色多，亮堂鲜艳；如果你的坏日子多，那就是黑灰色多，阴云密布。

什么是好坏日子的分水岭，试金石呢？看法恐怕就不一致了。比如，钱吗？好像不是，有钱的人不一定承认他过的是好日子，钱少的人或没钱的人，也不一定感觉他过的是坏日子。健康吗？好像也不是。无痛无灾的人不一定觉得他过的是好日子，罹病残疾的人也不一定承认

“哪里死了呢？明明还活着啊！”老人还由他们养，堂客还由他们弄，连娃崽的学费也还是由他们出，只是家里少了一个影子。没关系的，同外打工差不多。”

事故之后

韩少功

受害者的家里呢，如果没有补偿，就只能讨饭。“但事实终究是事实……”我支吾着。

“事实是，现在三个家都有了活路，有什么不好？”

“那……供电公司是不是有点儿太……”

“你说冤枉？是有点儿。但他们放点儿血，不过是九牛一毛，更不过是酒楼里少了几次平、麻将桌上少点几个炮儿。你还不知道他们？”

我无语可说。我以前只知道度的重要，但眼下不得不承认，法外有法，非法法也。山民们心目中自有一套更为重要的潜规则。这种规则在后果与动机之间更关注动机，比如考虑到肇事者并无恶意，因此须从轻发落；在死者与生者之间更关切生者，比如考虑到两家遗孤都要活人，那么补偿就比查案更重要。他们还怕恨供电公司赚得太多太容易，太霸气，这次切不可放过。这一切算计如果不是颠倒黑白，至少也是颠倒主次，活脱脱造出了一个假案。但

格布上的花

毕淑敏

他过的就是坏日子。美丽和能力吗？似乎更不像了。看看周围，有多少漂亮能干的男人女人，锁着眉苦着脸，抱怨着岁月的难熬啊……说了若干的标准，都不是。那么，什么是好日子和坏日子的界线呢？

不知他人的答案如何，我猜，是爱吧？

山民们认为此事办得天理昭昭无可置疑，他们不约而同不假思索地胡言乱语，乡村干部也不约而同不假思索地两面三刀，反正是要逼供电公司掏“银子”——何况公司也不是完全没有责任。

我不大能接受这种胡来和恶搞，但三个贫困家庭(受害者两家加肇事者一家)由此免了灭顶之灾，在没有工伤保险的情况下能继续活命，又不能不说是各种结果中最让人心安的结果。我能说些什么。

事情就这样过去了，村民们对结局十分满意。

有人说：“他们死得好啊！你想想看，一没有吃药，二没有打针，三没有动刀子，什么苦都没有吃，就像一觉睡过去了。这种死法哪里去死？”

另一个说：“哪里死了呢？明明还活着啊！”老人还由他们养，堂客还由他们养，连娃崽的学费也是由他们出，只是家里少了一个影子。没关系的，同外打工差不多。”

还有一个更是无限憧憬：“我下次一定要给供电公司打工去！吊也要挑棵大树不是？挑河也要选条大河不是？”

东一句，西一句，事情就真的这样过去了。

摘自《三峡文学》

美文闲读

有爱的日子，也许我们很穷，但每一分钱都能带给我们双倍快乐。也许我们的身体坏了，每况愈下，但我们牵着爱人的手，慢慢老去，旅途就不再孤独。也许我们是平凡和微渺的，但我们竭尽全力做着喜欢的事，心中便充溢温暖和安宁。

这是什么呢？这就是好日子了。你的那块格子布上，绽开了鲜花。

摘自《有爱的日子》

“哪里死了呢？明明还活着啊！”老人还由他们养，堂客还由他们出，只是家里少了一个影子。没关系的，同外打工差不多。”

事故之后

韩少功

受害者的家里呢，如果没有补偿，就只能讨饭。“但事实终究是事实……”我支吾着。

“事实是，现在三个家都有了活路，有什么不好？”

“那……供电公司是不是有点儿太……”

“你说冤枉？是有点儿。但他们放点儿血，不过是九牛一毛，更不过是酒楼里少了几次平、麻将桌上少点几个炮儿。你还不知道他们？”

我无语可说。我以前只知道度的重要，但眼下不得不承认，法外有法，非法法也。山民们心目中自有一套更为重要的潜规则。这种规则在后果与动机之间更关注动机，比如考虑到肇事者并无恶意，因此须从轻发落；在死者与生者之间更关切生者，比如考虑到两家遗孤都要活人，那么补偿就比查案更重要。他们还怕恨供电公司赚得太多太容易，太霸气，这次切不可放过。这一切算计如果不是颠倒黑白，至少也是颠倒主次，活脱脱造出了一个假案。但

摘自《三峡文学》